

费乐仁谈典籍翻译与中西文化交流

□ 受访人: 费乐仁 (Lauren Frederick Pfister)

□ 访问人: 可 凡 姚珺玲

长着一张典型的欧洲人面孔,却穿中山装;母语不是中文,却用中文大声宣布我是中国人。这些看似十分矛盾的现象,在费乐仁教授身上却显得那么和谐。每一位走近他的人都不由得被他周身散发着的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之情深深感染,这就是费乐仁,一位在美国出生的瑞士人,一个有着多学科背景的学者,一个可以被称为历史学家、比较哲学家、比较宗教学家的学者。

费乐仁,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比较哲学博士,1987年迄今在香港浸会大学宗教及哲学系任教。费乐仁教授苦心钻研汉学,对中国语言及文化有着深厚的造诣。除了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粤语、普通话、西班牙语及德语外,费乐仁教授还精通其他多国语言,包括法语、菲律宾语、日语、古希腊语、希伯来语等。他的研究范围包括中国哲学史、19世纪欧洲汉学、中国基督教史、跨文化诠释学等。2004年出版的他15年间从跨学科、跨文化、多角度阐释汉学家理雅各 (James Legge, 1815—1897) 及其中国古代经典翻译的学术专著 *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被评为美国2004年度有关传教研究的杰出著作。费乐仁教授近期研究的课题包括德国来华传教士汉学家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及其翻译、20世纪中国诠释学、耶儒对话等,由于他精通中西语言并具有深厚的哲学及历史学根基,多次应邀为《哲学词典》等撰写有关中国哲学的条目,还主持了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的英译项目,英译本将于2011年年内出版。目前,费乐仁教授正在主持《理雅各文集》项目,为影印再版的

理雅各经典翻译作序；一部有关卫礼贤生平与著述的专著将于近年出版。他在研究中常有新见，发表的学术论文计 130 余篇，自编教材 3 种，在德国波恩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访学，并在瑞士伯尔尼大学、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等世界各地知名学府开设讲座。

2008 年 3 月 27 日，费乐仁在北京外国语大学逸夫楼作了题为“中国典籍西译之三巨擎——重温理雅各、顾赛芬、卫礼贤的翻译经典”的报告，他以开阔的视野将其多元文化视角下对翻译的独到见解娓娓道来。本刊记者借机采访了他。

访问人（可凡、姚珺玲，以下简称“访”）：我们应该怎样称呼您？汉学家？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称呼？您的中文名字有什么特殊的意思吗？

费乐仁教授（以下简称“费”）：我觉得，我首先是历史学家，然后才是哲学家、宗教学家和人文学者。我的名字最初是根据我的原名的发音而来，我很喜欢我的中文名字“乐仁”。我会告诉别人，快乐的“乐”，仁爱的“仁”，这个名字体现了我对儒学感兴趣，也表现出了我的精神。

访：您祖籍瑞士，在美国出生，在我们看来，您具有典型的欧洲外表，眼神里透出的热情和对多元文化的接纳态度无一不体现出美国“特色”，可是您却始终在谈论中国，说中国话，吃中式菜，而且已经成为香港公民，您真的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吗？

费：在我看来，不一定吃中式菜、穿中式服装就是中国人。我接触中国古代和现代的历史已经 30 年了，会普通话和粤语两种中国语言，我参与、认同中国的文化和智慧，中国人也接纳我。与此同时，我又是香港政府认可的永久居民，我认为我在精神上是一个中国人。

访：您除母语英语外，能说和使用的语言还有普通话、粤语、德语、西班牙语等。您对于语言学习，特别是对于汉语学习，有什么窍门吗？

费：我认为学习的动机很重要。我的窍门就是爱加上足够的练习。1976 年到 1977 年，我在菲律宾时，看到很多华人崇拜毛泽东。以我所接受的美国教育，对这种现象很不理解，为了想搞清个中原因，所以就产生了学习汉语的念头。我 26 岁才开始学习汉语，刚开始时觉得汉语真的很难，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还是克服了困难坚持下来了。

语言不只是沟通的工具。一个人经过语言的培养，可以达到一种新的文化，文化也因此扩大了。比如我学汉语，就会尝试用汉语来说，用中国礼仪来做。我学习西班牙语，就会尝试用西班牙语来说，按照西班牙礼仪来做。我一直以语言为媒介来自觉实现自己到另外一种文化的转化。在这一过程中一定要有自觉性，因为进入一种语言很不容易。

访:我们是通过您对理雅各、何进善和王韬的研究认识您的。即使在中国,真正阅读过理雅各中国古代经典译本的人也很少,而逐字对照阅读中文原文以及理雅各的若干英译本的人就更少了,这也是国内外学者对您的研究尤其佩服的原因之一。当理雅各翻译中文经典时,他有王韬这样优秀的助手与其合作;您在研究中如果遇到困难,对中文原文不太理解时,有谁帮助您吗?您在研究中是如何与中国学者展开合作的?

费:合作应该是在真诚讨论基础上达成的合作。以理雅各和王韬的合作为例,《诗经》是王韬最擅长的,理雅各在《诗经》译本的注释里提到王韬 20 多次,并且解释了他为什么同意或者不同意的理由。两人的分歧点在于理雅各觉得王韬对《诗经》的理解过于传统,他更偏爱朱熹。

学术交流应该互相帮助,一个好的合作伙伴对学术的发展至关重要。所以,一个可靠的合作者是需要经过精心挑选的。我认为翻译不只和语言水平有关,翻译还和一个人的历史背景和世界观有关。因此,如果有可能,翻译应该是建立在对话的基础上,经过一个可靠的学术对话,找到一个文本的精神所在,这对翻译是很有必要的。例如,我在处理一些和历史有关的东西时,有时我只可以了解一些字面的意思,对于其内在的意义我需要借助合作伙伴的帮助。从这一意义上来讲,翻译不只是翻译,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是一个合作的过程。

访:从您的文章、讲座以及谈话中,我们发现您总是强调要以一种历史的、动态的发展观去理解或评价理雅各的译本。对于同一部中国典籍,例如《诗经》,为什么理雅各会有这么多不同的译本?在您看来,评判理雅各不同时期译本的高下有没有一个标准?

费:理雅各译经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有许多中文经典理雅各至少翻译过两次,像《大学》和《中庸》,理雅各分别翻译并出版过四个版本。我以三个《诗经》译本中的两个为例说明这个问题,第一版 1872 年的《诗经》译本是从字义翻译的散文体。6 年后,理雅各开始反省,认识到做一首诗最重要的不是字义,所以又重新以苏格兰诗歌的风格和语体特征翻译《诗经》。当然,大部分人不会像理雅各那样将一部书换一种文体重译。理雅各的多数经典译作并没有像《诗经》那样大规模地改头换面,他主要修改的是注解部分,通常是改正其中的错误或者增加新材料。

至于如何评价不同版本的高下,我的建议是不要评价一个文本的不同版本。如果你问画家他所有的画作中最好的画是哪一个,画家会说:“请你告诉我。”画家真诚地表达了自己的感觉,观看者如何理解是画家无法把握的。

对我来讲,理想的译作应该有译者的风格和创意在里面。我(译者)是它们(译著)的口,它们是我的脑,我愿意通过它们来说话。研究理雅各的不同译本,必

须回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要动态地追踪各个译本的发展变化,从解释学的角度对其进行阐释和分析。我认为这个过程虽然复杂、有挑战性,却更加有趣。

访:中国典籍有许多被译介到海外,其中有些典籍在历史上存在数量众多的译本,您认为该怎样评价一部经典的多种译本?是否存在一个具有普遍性的评价标准?

费:一部经典有多种译本是一件很好的事。至于评价,这与翻译的本质有关。我认为,翻译是一种“传译”,不是一种简单的技术。

例如翻译佛教经典时,就不能随便翻译,因为其中很多东西是不可译的。《华严经》需要阅读多种注释后才能明白文本的意义。翻译不讨论抽象的办法,讨论的是文本,所以一定要根据文本来确定具体的翻译办法。经文就要以经文的方式来翻译,如果用俗语和口语来翻译是不行的。理雅各曾经在1872年以散文体翻译了《诗经》,受到了苏格兰知识分子的批评,因为他们从他的译文中读不到中国诗的味道。中国的经典经过翻译家的翻译,马上成为另外一种语言的经典,这就是翻译的经典。

翻译要清楚文本,要自觉地了解自己的工作对象是什么,翻译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是以“文字漂亮”为标准,还是以别的标准来判断。理雅各的英文不那么漂亮,然而他忠实原著,所以同样是一种好的翻译。

目标决定翻译的表现。有些译著的翻译非常漂亮,并因此影响了很多人。如果你将原文和译文对照,却经常发现译文中很漂亮的句子在原文中找不到。这种翻译同样可以成为最有名的译著之一,但是无法成为最好的译著。我认为翻译的态度要谦卑,要先看原著和文本,然后再做判断。

访:以您跨文化的经历,您怎样理解和诠释“文化”一词?您是否认为中西文化存在差异?中西文化之间应该怎样进行对话?

费:许多人在谈文化时,更多关注的是“文”,而忽略了“化”,即就是“转化和突破”的过程。

我在接触不同的文化时,一直在问自己,“为什么在这种文化中会产生这样的思想?”我通过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看世界中的现象,然后通过这些现象想到一个概念,努力思考怎样把别人的“化”为自己的。就像农民种一粒种子,经过辛苦的耕作,使其长成一个新的植物。经过这样的转化,把另外一种智慧为己所用。中国人接纳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参与了他们的智慧,实质是我们对彼此的文化互相认同。

文化和人一样都是活着的东西,可以活,也可以死。文化是指一种内在的认同。一种文化的传承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的循环。通过传承可以产生智慧,而非仅有知识。智慧显示的是内在的领悟和灵感,知识是属于基础层面的,它们形成了

一个循环和更新的过程。如果从教育的过程来看待这个过程,教师将有价值的东西传给年轻人,以及年轻人怎样利用这些知识形成智慧就是一个更新的过程。问题在于文化本身非常复杂,是多元动态的整体,包含对过去传统的认同、对内在价值观的肯定、对未来的渴望和挑战等多个方面。

多种文化可以并存,中西政府的观念可能不同,可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本身也是多元的。限制我们智慧的可能是以国界的划分谈文化。

不同文化之间的人怎样进行对话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比如,面对其他能接纳我的人或者是反对我、与我对立的人时,首先要选择好与其对话的内容。朋友不是一种自然的关系,是在尊敬和倾听的基础上努力达到的一种心灵的沟通。当不了解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生活时,别人听懂你的话和理解你的话完全是两码事。这时,你必须努力抛开自己的文化尝试进入异国的文化,建立一种新的关系。文化是可以转化的,虽然很困难,可是很重要。我自己有过这样的体验: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经过真诚的商榷,最终通过转化取得了对话的成功。经过艰难的转化过程之后,我开始体验到中华文化的精髓,实现了精神上的突破。

我本人以为中西文化的概念属于 19 世纪,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而使用“中”、“西”有其政治因素在里面。在 21 世纪,我们应该讲“多元文化”。

置身于一个颇似书房的咖啡馆,我们沉浸在与费乐仁教授轻松而愉快的对话中。他的妻子梅乐诗(Mirasy)耐心地在在一旁等候,时不时地与费乐仁教授交换一个会心的眼神、一个甜蜜的微笑。今年以来,费乐仁教授辗转上海、北京、青岛、瑞士、英国、香港等地,当费乐仁教授谈到旅行中遇到的人或事情,一时想不起人名或地名,用英语询问梅乐诗时,她总能立即提示出名字,费乐仁教授笑着说,瞧,这就是我的贤妻(my good wife)。看到这样的情景,我们打消了为什么他没有像许多汉学家娶中国妻子的疑问,还有什么比耐心聆听丈夫两三个小时用外语侃侃而谈,而始终陪伴在他身旁的妻子更令人感动的呢,这个问题已经被爱消融了。如果说每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付出的女人,我们就更加理解了费乐仁教授的成功。在采访结束之际,我们向费乐仁夫妇致以了最衷心的祝福,费乐仁教授通过与内地学者的合作与交流,他的研究一定会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作者单位:可凡: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海外汉学研究中心

姚珺玲:河南理工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